

第二章 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简史

合浦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的东北岸，作为江河汇集于海之地，具有江海联运、开展海外交往的优越地理条件。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即在岭南设置合浦等七郡，至此合浦被纳入汉王朝的郡县体系。随着由官方组织的译使及应募者从合浦、徐闻、日南出发进行海上贸易日渐频繁，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汉代合浦是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港口，是中原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枢纽，是一个中外商贾云集、繁华富庶的国际商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合浦周边地区社会动乱频仍，加之造船技术进步、朝廷岭南经略重心变迁，合浦港作为军事港的地位凸显，商贸功能有所下降。直到唐宋时期，合浦作为东南亚、南亚及海外诸国朝贡中原王朝的重要通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水陆交通的开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珍珠、米、布、瓷器、香料等商品通过合浦港运往中原腹地、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合浦再次成为沟通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同时发挥着中国西南地区内外贸易集散地的作用。

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1]这是古文献中关于中国由官方主持进行远距离海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从这则材料可知，西汉王朝的使者在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官和应募参加海上航行的冒险者的陪同下，携带黄金和各类丝织品从合浦郡的徐闻、合浦和日南的障塞起航，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前往南海诸国开展政治、经济交流活动，主要进行官方商贸活动。汉使团买回的商品主要有“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合浦县”下注“有关”^[2]。汉代“关”的职能主要有管理过往商旅、征收关税、缉私防卫等，可见西汉政府已经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行有效的监管。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共发掘了1200多座墓葬，出土文物近2万件（套），“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玻璃器以及各类珠饰，经认定的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有关的文物共有1300多件（套）”^[3]。

《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

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4]方国瑜对这一记载进行了翔实考证，得出战国晚期蜀王子由蜀至交趾经滇中是可信的结论^[5]，说明战国后期云南已经与今越南北部湾地区有道路联通。西汉末年，王莽任命文齐为益州太守（郡治滇池）。此时公孙述割据蜀地，招降文齐，文齐坚决不附。后东汉建武元年（25年），“闻光武帝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6]。文齐“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7]，即由滇池出交趾，然后转道赴河北，可见当时云南至交趾的道路是通行的。建武十七年（41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长沙、桂阳、苍梧兵万余人征讨交趾。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平定叛乱。马援在交趾期间，曾上书朝廷：“从麋泠出贵古击益州……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又说：“从麋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贵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8]建武十八年（42年），益州郡渠帅栋蚕起兵反汉，声势甚炽。当时马援在交趾，得知益州郡蛮夷叛乱，故上书朝廷，希望从交趾直接北上益州郡策应平叛，可见当时滇池与交趾间交通畅通，可互通消息。根据马援的上书，从交趾往滇池，有麋泠水道可通行大军和“兵车资运”，这条“进桑麋泠道”是由交趾至益州郡治滇池县的道路。该道路从东汉在今越南北方设置的交趾郡（郡治龙编，红河入海口海防一带）出发，通过水路沿红河北上，经交趾北部重镇麋泠（今越南永富省富寿地区）至益州郡进桑（今云南河口县）、贵古（今云南蒙自市）到西随（今云南个旧市蔓耗镇）由水路改陆行，到达滇池县。“进桑麋泠道”是汉代及其以后云南与越南北部湾地区间往来的重要交通道路，沟通了交州与云南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联系。

汉代，“进桑麋泠道”（进桑道）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等地五尺道、灵关道（“蜀身毒道”）、贵州经广西至广州的牂牁道、广州经北部湾至交州的交广海路一起构成了中国岭南、西南以及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网络。三国时期，“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9]，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出铜、铁、铅、锡、金、银”，还有光珠、琥珀、水晶、翡翠、蚌珠、琉璃和轲虫、孔雀、犀、象、猩猩、豹兽等。其中琉璃、轲虫、蚌珠等物皆不是哀牢本地所产，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商品，蚌珠很有可能来自今广西北部湾地区。可见汉代广西北部湾地区与交趾及云南、四川等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相互联通，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通过北部湾交州港与海外世界发生联系，大大开拓了对外交往的范围，也使北部湾交州港、合浦港获得了云南、四川、贵州及中原地区广阔的贸易市场，促进了中国岭南、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确切描述与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

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0]

在这则材料的记载中，该航行活动的主导者为“译长”，这个人物非常引人注目。文中称译长为官员，“属黄门”。《汉书》载：“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11]黄门是专为天子服务的官署机构。译长同“应募者”一起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显然是由官方主导的，目的是以“黄金杂缯”与南海诸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可以推测，在官方派遣使者前，民间就已经与海上诸国有一定的贸易往来。而在民间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相对成熟后，官方使者才与“应募者”沿着路线航行贸易。

《汉书》中所讲“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是合浦几乎被公认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文献依据。文中所提及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谿离国等对应西汉时期当地历史上的哪个人群，至今学界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然而，对于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已程不国即狮子国亦即今斯里兰卡的认识基本一致。因此，大致可以确定，其先后经行的地方为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及斯里兰卡等地。

东汉年间，合浦的西海道又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据《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2]大秦，即今罗马。自日南沿

海岸而北上，无论是直接从西南海岸登陆由内河航道进献，还是继续航行至东南海岸登陆，合浦都是必经之地。根据《后汉书》记载：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13]

当时掸国位于中南半岛西岸，濒临孟加拉湾，已开辟由日南北上进献的道路，“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14]。而掸国与大秦已经互通往来，且掸国称大秦为海西，故可推测其往来行海路以掸国为中介，将两段海路拼接，即构成自大秦出阿拉伯半岛，绕印度半岛，经斯里兰卡、孟加拉湾，沿中南半岛东海岸北上经合浦的海道。然而这条海道当时主要由大秦人开辟及进行航海活动，“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15]，但是扶南、日南、交趾等地方的人却“少有到大秦者”，汉人则更不必说。

合浦的东海道可绕雷州半岛，过广州抵达东南沿岸福建等地。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港时属会稽郡（今福建福州），可见东汉时从交趾过合浦再东航至福建一带的海道已经通行，但是这条海道常常“风波艰阻，沉溺相系”。^[16]

二、中古时期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政治、军事交往

三国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合浦不仅是海外各国通广州、越灵渠的中转港，还因盛产珍珠而成为闻名的商港。三国时期岭南属吴国管辖，孙权封士燮为左将军，管理岭南地区。其时南流江沿岸产出的细葛和明珠深受贵族阶层的喜爱，士燮遣使进贡孙权的物产包括“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17]。这些贡品主要由交趾沿海运至合浦，再经南流江转送至绣江（今北流江）过灵渠抵达建业。由于合浦出产的珍珠多用于供奉吴国，所以当时合浦的珍珠贸易并未取得太大的发展。这一情况直到东晋时期才得以改变。交趾刺史陶璜向晋武帝上疏曰：“合浦郡土地饶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18]晋武帝准许了陶璜的请求，合浦珍珠得以流通于中原地区和海外诸国的市场，合浦港的水陆交通变得繁忙起来。

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年），交州李贲起兵叛乱，率兵占领交州，梁武帝派广州刺史卢子雄率领高州、新州两处兵马从番禺出发，由陆路至合浦征伐李贲。适逢春瘴盛行，兵士到达合浦之后死伤卜之六七，大军溃败而归。大同十年（544年），梁武帝派陈霸先率水军由番禺溯西江抵郁林，再沿南流江进入合浦。翌年十一月，陈霸先至交州与李贲鏖战。太清元年（547年），“贼众大溃，贲窜入屈僚洞中，屈僚斩贲，传首京师”^[19]。陈霸先平定交州叛乱后，势力日渐强盛，后取代梁朝建立陈朝。由于陈霸先在广州及合浦起家，对当地的海路交通非常熟悉，所以更重视广州及合浦等港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合浦及南流江作为贸易通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交、广分治以及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广西北部湾合浦港作为始发港地位有所衰落，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枢纽与港口城市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鱼豢《魏略》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20]表明大秦与中国之间除了陆上通道还有海上航线直达交趾刺史部所属七郡。晋初，交州刺史陶璜上疏晋武帝，“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21]，武帝采纳该建议。此后合浦“十月讫二月”，开放民间贸易，“粗者蠲除”对以珠贸米的合浦百姓十分有利。东晋时期，海

上丝绸之路贸易因“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22]。由于长官贪婪，肆意侵夺，导致日南、九真等地暴乱频发，交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也大受影响。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林邑王攻陷日南郡，“杀五千人”，“又袭九真，害土庶十八九”。“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23]南朝时期，交、广海路逐步恢复，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汎海凌波，因风远至”^[24]，南夷诸国“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25]。海外各国与中国通过交、广海路贸易往来增多，萧梁时期达到顶峰，“航海岁至，逾于前代”^[26]。广西北部湾合浦一带的海外贸易也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梁元帝职贡图赞》曰“北通玄兔，南渐朱鹫，交河悠远，合浦回遄，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27]，可见广西北部湾沿岸合浦在官方贸易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萧梁任昉《述异记》言“合浦有珠市”^[28]，合浦珍珠也随珠市流转各地。

三、唐宋时期合浦港复兴及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圈延伸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朝贡、漕运、贸易大多取海道。韩愈《送郑尚书序》载：“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围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9]可见东南亚诸国相当数量的珍珠、香料等奇珍异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以朝贡或商品贸易方式流入中国。

从地理位置看，广西沿海的钦、廉港口是中国西南地区最近、最方便的出海门户。唐宝历元年（825年），桂管观察使李渤“酺浚旧道，障泄有宜，舟楫利焉”^[30]。唐代后期，安南地区政局不稳，交州港作为与广州港并列的贸易港地位动摇。咸通七年（866年），唐政府派高骈任静海军节度使，出镇安南，整治安南到广州的海道，同时疏通广西沿海的海上运输通道，史载：“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剷治，由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31]由合浦通往内地的水上交通更为畅达，广西沿海航道经过整治，通行能力也大为提升。

唐代前期，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行较为宽松的管理政策，唐玄宗设市舶司，“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32]。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珍珠资源控制尚不严格，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戊子，停诸州贡珠”^[33]，这样就对以合浦、钦州为港口的内外贸易开展十分有利。广西北部

湾地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也有所恢复或开辟，贞观十二年（638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僚，置灋州”^[34]。同年，“渝州（今重庆）人侯弘仁，自群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35]。侯弘仁开辟的这条陆路交通线，沟通了中国西南与岭南及中原地区的联系，广西北部湾地区可以通过陆路经邕州到达桂州，并与中国西南腹地及交趾地区取得联系。“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36]无疑表明南宋以前廉州与安南地区商业联系更为紧密。唐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了以邕州、廉（钦）州为中心的陆上、海上交通枢纽，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成一片，共同构成中国西南地区相对完善的道路体系。

广西北部湾地区陆上通道的开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共同推动使之形成了特色市场。《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僚市”^[37]，“僚市”^[38]方便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沿海地带还出现了交易海产品与奇珍异物的“鬼市”，唐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39]这首诗生动展现了海边鬼市的采珠活动。“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40]内地商人与海外舶商追逐利益，甚至深入山村，收买特产。唐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中有“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枕椰叶，海外人收翡翠毛”^[41]之句。《盐铁论》云：“珠玑犀象……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42]自古以来，合浦等地“夷人号越筮，多采珠及甲香为业”^[43]，直到宋代，采珠“蛮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44]。由于夷民与山民大多质朴，缺乏商业经验，虽有奇珍，但获利不多。廉州、钦州在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迅速兴起，有航道与琼州以及海外诸国相通，是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广西北部湾地区商业有了较大发展。朝廷施行鼓励商贸措施，宋初，“岭南商贾贵生药及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45]，促进了民间商贸发展。北宋中期，廉州因“珠贝所产，富商萃焉”^[46]。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诏“蠲雷、化、高、融、宜、廉、邕、钦、贺、贵免行钱”^[47]，广两北部湾地区特别是钦州博易场吸引了交趾、广州、海南等地商人居民聚此交易，钦州博易场不仅是香药、宝货进出口的交易之所，而且成为各种商品聚集的中心市场。“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48]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唐宋时期广西与越南的贸易情况做了详细、具体、生动的描写：“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49]

广西北部湾地区居民大多主动参与商业贸易，合浦海中产珍珠，自古以来，合浦

等地“夷人号越菴，多采珠及甲香为业”^[50]，登民采珠被“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至于不赀”^[51]。钦州所产乌婪木是制作船舵的良木，具有广阔的市场，“此桅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价十倍矣”^[52]。“桂产于宾、钦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于东方。”^[53]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十月，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谈两广边郡走漏生口、铜钱事时说到：“邕、钦、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逐年规利之徒贸易金、香。”^[54]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知钦州戴万言：“邕、钦、廉州与交趾接，自守悴以下所积俸余，悉皆博易。”^[55]可见当地官民普遍参与商业贸易。

四、明清时期合浦与越南等地民间经济、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虽然受到禁海严令以及海盗袭扰的不利影响，但民间商贸往来仍然十分活跃，“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非盗边也。故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56]。滨海地域居民大多自觉投入商贸网络以谋私利，“濒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57]。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林希元任钦州知州。^[58]到任后，林希元根据实际情况，恢复防城圩，使之成为“西连交趾，贸易咸集”的边境贸易圩市。由于“商货多集于此，与夷人贸易，乃制税焉”^[59]。防城圩开放，获益良多。

明隆庆元年（1567年），廉州官府制定税则“船头规”，对抵港的商船进行征税。冠头岭地理位置优越，有许多天然港湾，“西跃出大海二十里，当郡城之坤维，若郡之外郭。其形隆起如冠，南北皆有澳，海舶蚁焉”^[60]。万历时期刘子麒在《冠头秋霁》诗中写道：“多少艨艟冲巨浪，凭虚一览尽秋毫。”^[61]艨艟借指大船。冠头岭港湾之中，商船繁多，在浪中出没，可见海外贸易的繁忙。嘉靖《钦州志》记载：“钦江一水，上通灵山，下达防城，商贾时集。旧有税银，州官视为已有，元至州始尽归之官，每季可得银一百四五十两，一年可得六百余两，从宽取也；尽法而取，又不止是矣。及安南事动，商旅鲜至，然每季犹可得银三四十两。”^[62]“安南事动”，指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进兵声讨莫登庸，此事对中越互市有一定的影响，但双边贸易往来并没有中断。到嘉靖年间复设巡检司署，对往来船只收盐税和进出口货物税。

清代广西北部湾到越南的交通线畅通，“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五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沿海岸行八日，始至海东，有白藤、安阳、涂山、多渔诸海口，各有支港以达交州，此海道大略也”，“自冠头岭而西，至于防城，有龙门七十二径，径径相通。径者，岛门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岛屿悬杂，而水道皆通。”^[63]可见清代包括合浦在内的北部湾滨海地域水道通畅，贸易往来仍然很频繁。

- [1]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671页。
- [2] 同[1]。
- [3]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年, 第49-136页。
- [4]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七《叶榆河》,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61页。
- [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 第7-11页。
- [6]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835页。
- [7]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〇下《文齐传》, 严茜子注,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年, 第170页。
- [8] 同[4], 第859页。
- [9]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南夷传》注引鱼豢《魏略》,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861页。
- [10]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671页。
- [11] 同[10], 卷六八《霍光传》, 第2932页。
- [12]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920页。
- [13]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2851页。
- [14] 同[13], 卷六《顺帝纪》, 第258页。
- [15]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八《夷貊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961页。
- [16] 同[13], 卷三三《郑弘传》, 第1156页。
- [17]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1192-1193页。
- [1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陶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1561页。
- [19] [唐]姚思廉:《陈书》卷一《高祖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3页。“赉甯入屈僚洞中, 屈僚斩赉”, “僚”原文为“獠”。因“獠”为民族歧视性称谓, 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偏见与历史局限性, 为与目前的政策、形势相适应, 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辩证对待, 用了偏中性且字形相近的“僚”来替代。后文仍有不少此类情况, 依此原则处理, 并注出原文。
- [20]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861页。
- [21] 同[18]。
- [22] 同[18], 卷九七《四夷列传》, 第2546页。
- [23] 同[22], 第2547页。
- [24]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七《夷蛮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399页。
- [25]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史臣曰》,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1018页。
- [26]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年, 第783页。
- [27]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七四《巧艺部·画》, 汪绍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1270页。
- [28]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〇二《宝·鲸鱼目》引任昉《述异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年, 第3236页。
- [29]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三〇《饌送·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年, 第3791页。
- [30]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一八《李渤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4286页。
- [31] 同[30], 卷二二四《高骈传》, 第6392页。
- [32] 同[29], 卷六一三《表》, 第3180页。
- [33]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57页。

- [3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岭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8页。此句中“开拓夷僚”，“僚”原文为“獠”。
- [3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48页。
- [36]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一《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页。
- [37]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獠市》，商璧、潘博校，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 [38] “僚市”，“僚”原文为“獠”。
- [39]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九四《岛夷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592页。
- [40]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八二《诗·送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435页。
- [41] 同[39]，卷六三五《送杨环校书归广南》，第7292页。
- [42]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
- [43] [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27页。
- [44]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九《宝货门·珠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9页。
- [45] [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商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41页。
- [46]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〇《广南西路·廉州》，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918页。
- [47] 同[45]，卷一八六《食货下八·市易》，第4555页。
- [48] 同[44]，卷一《地理门·并边》，第4页。
- [49] 同[44]，卷一《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第53页。
- [50] [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太平军》，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27页。
- [51] 同[44]。
- [52] 同[44]，卷六《器用门·柈》，第220页。
- [53] 同[44]，卷八《花木门·桂》，第287页。
- [5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九《绍兴三年十月戊戌》，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3页。
- [5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之《刑法二·一四七》、《食货三八·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85页。
- [56] [明]张瀚：《松窗梦语》，萧国亮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 [57]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96页。
- [58]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三《金事林次暉先生学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6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台湾），1986年，第630页。
- [59]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崇祯十年（1637年）刻本影印，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 [60] 同[59]，卷二《地理志》，第31页。
- [61] 同[59]，卷一三《诗赋志》，第245页。
- [62] [明]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三《食货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 [63]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魏源全集》第十七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502页。